

大家写广州

俄罗斯教授的来信

□谢有顺

唯有兰花香正好

□颜武昇

中秋节那天，收到鲍罗德金教授的来信，他说莫斯科开始变冷了，他想念深圳的温暖。他来过深圳多次，去年九月，还来何香凝美术馆看了新加坡艺术家张荔英的回顾展。张荔英早年游学巴黎，作品兼具印象派色彩与东方内敛气质，对她跨越欧亚的现代艺术探索风格，鲍罗德金教授非常喜欢。那次他还看了一个“木刻记忆”的专题展，他认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艺术的重要脉络。见他对木刻感兴趣，我还陪他去大芬村走访了几个版画工作室，然后他带着家人去大梅沙住了几天，才从深圳去山西。

这次，他还发来了去年在大梅沙时的相片。

照片里的他，穿着短袖，站在宾馆的窗前，落地窗很大，大到不像一扇窗，倒像有人把海轻轻推到了床前。窗外，沙滩弯成一道柔软的弧线，细沙被晨光烘得金灿灿的。潮水显然把昨日杂乱的脚印都收走了，沙滩上的那片平整，就像大海刚刚合上的一册日记。早起的救生员拖着红黄的浮标走过，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山也褪成了淡青色；更远处，货轮小得像孩子的玩具，天与海已分不清谁是谁的边了。

大概是记起了在深圳看过的木刻展，鲍罗德金教授在信中说，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最近也有尼古拉·库兹明的版画展。我对尼古拉·库兹明并不了解，只约略知道，他为普希金、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画过插图，为列斯科夫《左撇子》画的插图尤为知名，版画中融入了现代平面语言，幽默而又悲悯。

鲍罗德金是历史学教授，却有很高的艺术修养，和他聊天，常有意外的收获。

我是上一次去俄罗斯时认识他的。那一年，俄罗斯主办世界杯，我和几个作家去看开幕式，记得当时莫斯科的街头气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热烈，大街小巷的广告牌、标语很少，游客也没想象的那么多，广袤的俄罗斯，一切都是不动声色的，这令人想起俄罗斯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草原，辽阔而安静。在俄罗斯，见得更多的是高远的蓝天、爽净的河流、自由生长的树林和草地，以及许多刺向天空的教堂的穹顶。高楼并不多，但整洁而有秩序；吃的东西也不丰富，土豆和牛肉而已，做得却用心；遇见的每一个俄罗斯人，都会让你觉得，他们的内心藏着丰富的故事。

见到鲍罗德金教授时，我和几个同伴在亚历山大公园里逛。公园很大，走着走着，大家就散开了。我看到一对正在拍结婚照的情侣，旁边还有好几个学生围在那里写生，草坪上，一群孩子在奔跑。大家恬静地享受着阳光与草地。在小教堂门口，有一个俄罗斯人静静地望向一栋老房子的大门，悠闲，自在。借助翻译，我走过去与他聊天。他就是鲍罗德金教授，在一所普通大学教历史。他的语气并不热情，也不冷漠，倾听时不插话，若有所思。

他对中国不陌生，并充满好奇。我们从那对马上要结婚的青年男女开始聊起。他是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的，下午三点，在小教堂里举行。这对

青年，有一个是他的学生，毕业后去了一家小博物馆，生活简单、轻松，同时也做一点自己的研究。“他刚大学毕业两年，就结婚了，生活压力大吗？”教授似乎知道我的话意，指着远处的他们说，他们多快乐啊！青春是最美的事物。俄罗斯的青年，仍然信仰爱情，两情相悦之外的一切，都不重要。没有人会在爱情的选择上，附加房子、家境、收入这样的话题。听说中国的房子不便宜，他告诉我们，俄罗斯不能炒房，报纸上也几乎没有房地产广告——谈这一点时，翻译还多解释了几句，我们双方才听懂。俄罗斯的青年，思想变化也很大，网络时代的宠儿，不可能不受各种风潮的影响，但俄罗斯最值得骄傲的是重视精神生活。物质不是灵魂追求的目标，爱情才是美好的，有尊严的生活才能让一个人激情澎湃。

我默默地听着。我相信那对青年脸上的幸福的光，是来自爱情本身。

和教授说着话，一边不知不觉已走到河岸边，那些写生的学生，还是那么专注。我过去瞥了一眼，发现他们都在画河流、树林和教堂，经典的题材，神情庄严。我想起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看的画，那些一百多年前的风物和眼神——那些俄罗斯人的身体和灵魂，如此饱满，又如此真实。

我想，身体是一种遗传，灵魂也是。

我们很自然就聊到了俄罗斯文学。鲍罗德金教授知道我是文学教授后，表情一下丰富起来，他显然也是一个文学迷。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屠格涅夫，他兴奋地说出《父与子》《猎人笔记》等作品名字。我告诉他，我最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他却独爱《白痴》。我的俄罗斯之行，带的正是上下卷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我说我还

用毛笔抄下了里面的一句话：“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，而且神秘。围绕着这事儿，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，战场便在人们心中。”我翻出微信图片给他看我抄的话，他似乎对汉字也有兴趣，看了好一会说，中国在很多方面是深奥的。

我说，俄罗斯作家经常书写一个人灵魂里的论辩与搏斗，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，也是一部长篇小说最壮丽、最震撼人心的一面。我还背诵了一句茨维塔耶娃的诗：“我独自一人/对自己的灵魂/满怀着巨大的爱情。”鲍罗德金教授说，这就是俄罗斯人的秘密“世界”，有了这个秘密“世界”的人，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他。

他见我露出肃然的眼神，马上又说，你们中国人也有这个“世界”，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就有。唐僧能力最弱，但西天取经的意志却最坚定，因为他有信念。孙悟空武艺高强，常常负气出走；猪八戒动不动闹着分行李；沙和尚是一个没主见的人。可是，即便徒弟们都走了，唐僧一人也不畏风险要往西天走，了不起。唐僧就是有自己的秘密“世界”的人。

我惊讶于他对《西游记》的理解，并告诉他孙悟空也有自己的秘密“世界”。《西游记》第二十四回中，唐僧来到一处美景前，心中欢喜，以为离雷音寺已经不远了，孙悟空却告诉他，到雷音寺还有十万八千里，你自小时走到老，老了再小，老小千番也难到，但“只要你见性志诚，念念回首处，即是灵山”，这话就是孙悟空的秘密“世界”，比唐僧悟得还深。

鲍罗德金教授似乎没完全听懂，但他对小说最后晒晾经卷的情节印象深刻，小说里写石头把晒的经尾沾破了，唐僧为此懊恼，孙悟空却说天地本不全，经卷沾破，正应了“不全”之奥妙。鲍罗德金教授说，这个见识太深刻了，他在课堂上经

常引用这个观点，因为他研究历史，知道“残缺”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话题聊到这里，也许略显沉重，就停了下来。我问他，一会儿婚礼之后你们喝酒吗。他说，今天不喝，专门的婚礼酒会才喝酒，喝红酒。不喝伏特加吗？鲍罗德金教授摇摇头，伏特加喝多了，怕有人会醉酒闹事。不过，世界杯期间，政府解除了禁酒令，可以喝酒庆祝了。再过些日子，俄罗斯就白雪遍野、寒风凛冽了，也必须得喝酒。只有伏特加可以傲视寒冷。他还神秘地告诉我，“伏特加里藏着俄罗斯人的灵魂”。他的谈话总是言及“灵魂”一词。

他对酒的喜欢，溢于言表。我说伏特加太烈了，中国的白酒度数比伏特加更高，反而醇厚、柔和。他说也喝过中国的酒，味道不一样，他又大声强调了一遍，不一样的。

我忽然想起随身包里有一小瓶酒，是二两装的，前一晚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一场晚宴时中国酒企送的，据说是世界级艺术晚宴设计师 Charles Kaisin 设计的作品，他把西方美食与中国美酒相结合，尤其是富有创意的中国元素的应用，把现场的俄罗斯人都惊到了。当时看它包装精美，我就顺手揣在包里了。我把这一小瓶酒送给他，他端详半天，似乎在看什么，我又拿过来拧开盖子，说这是中国的好酒，请他喝一口，他指着前面的教堂说，上帝不喜欢我喝酒的。然后大笑。他闻了闻打开的酒，连说了几句很香，小心拧紧瓶盖，放进了自己的包里。然后他看了看表，说婚礼就要开始了，向我告辞，往教堂走去。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，悠扬的钟声已经响了许久了。

之后每次收到鲍罗德金教授的来信，我总会想起那天下午莫斯科的钟声，那次触动心灵的闲聊。



河畔秋光 AI制图

新舞台

近些年

□黄灿灿

近些年我读无知书，译已知人，看不惯构词法，思想也没了，成了大地行者，头顶阳光，心中盼望着何时下暴雨。

偶尔被刺球勾住牛仔裤，偶尔到小镇上喝美式咖啡吃纽约芝士蛋糕，不回顾近些年究竟自己是自己呢还是

自己也没了，或自己是自己的自己呢还是自己眼中别人的眼中的自己，不锻炼新的眼光或小跑出旧的视野，

不考虑近些年考虑自己时是否能经得起自己置身的乡村的绿道、河道、野地、野草和花鸟、泥沙的总测试。

去年初秋的午后，我第一次真正走进广州兰圃。

南方的秋来得矜持，暑气未退，风已先柔。一墙隔绝市井车马喧嚣，园内骤然归于宁静。曲径通幽，流水冷冷，竹影婆娑，满目清雅。满园兰草依石傍水，静立无言。我俯身细看一株初绽的建兰，花叶朴素，不争不闹，唯有一缕幽香淡淡漫来。

这香气极有分寸。你快步而行，它悄然隐去；你静心驻足，它温柔相拥。不张扬、不讨好、不刻意，轻轻抚平人心深处的躁动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懂得，孔子咏兰，何以誉之为“王者香”。所谓王者之风，从不在于声势浩大，而在于分寸自持、沉静自守。

当今时代，人人步履匆匆，追热度、逐流量、求速成。我们习惯了喧嚣造势、高调张扬、速效兑现，渐渐淡忘从容内敛、长久坚守的意义。世间万物竞相争春、争名、争利，唯有幽兰，甘于静默，甘于沉寂，纵使无人欣赏，依旧暗自芬芳。此后一年，我数次重访兰圃。园路修葺一新，花木日渐丰茂，游人往来不绝。这座藏于闹市深处的园子，愈发温润鲜活，自带呼吸与温度。我常在兰前伫立自问：越是浮躁的时代，我们越需要兰的品格。身处喧嚣尘世，我们能否如幽兰一般，守得住本心，耐得住清寂？

我曾在南昆山兰花谷遇见一位养兰人。他俯身梳理兰根，神情虔诚安然。他缓缓说道：“兰娇贵，心不静，养不好她。”一语入心。

养兰，养的从来不是花草，而是人心。心浮则花躁，心定则兰幽。人世亦然：我们太过急于求成，渴望即刻被看见、即时有回报，却常常忽略扎根沉淀、静默生长的力量。

兰圃留存着一段动人的红色风雅。朱德元帅深爱此园、珍爱幽兰，曾将珍藏

“我与罗浮同不睡”

□陈楚宣

每逢中秋，总会想起罗浮山上那个身影。

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一位内渡的台湾诗人在罗浮山上写下：“仙山来作中秋节，月比人间分外圆。我与罗浮同不睡，坐看明月过中天。”——他叫丘逢甲，此时距他抗日保台失败、含恨内渡，已过去整整十五年。

1895年，甲午战败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。消息传来，丘逢甲刺破手指，血书“拒倭守土”四字。他率义军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昼夜，终因弹药弹尽而撤退。部将劝他内渡，说“能强祖国，则可复土雪耻”。这句话，成了他此后十五年人生的行动纲领。

乘木帆船内渡时，他写下“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臣无力可回天”。抵达泉州后，因连年忧劳与海上颠簸，忽呕血数升，几乎不起。此后定居广东镇平县淡水村，建“培远堂”，坐向朝东——那是台湾的方向。他将长子改名“念台”，在诗中写道：“不知成异域，夜夜梦台湾。”

内渡后的第一个中秋，他在蕉岭乌石冈与三弟一同赏月，写下“弹指仙凡相隔易，称心人月并圆难”。月圆而人已散，兄弟虽在而故土已失。这是丘逢甲中秋诗作的起点，月圆之夜，他无法安睡。

1897年，丘逢甲奉旨“归籍海阳”，出任韩山书院主讲。他选择落籍潮州而非故乡蕉岭，因为潮州地处粤东中心，风气较为开放。他以“实学训士”，向青年学子介绍新思潮和东西方文明。然而书院守旧势力攻击他“离经叛道”，结果“被目为异端，遭当道忌”，岁终愤然辞去。

韩山受挫，使他深刻意识到：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的环境下，仅靠改造旧式书院难以推行新学，必须另辟蹊径。1898年，应潮阳县令裴景福之聘，丘逢甲出任潮阳东山书院山长。东山书院创建于1819年，原以经学为主。丘逢甲到任后彻底打破旧制，增设物理、化学、算术等科目，主张德、智、体三育并举，使东山书院成为“粤东新学之肇端”。今日潮汕第一中学即以其为前身。他在东山书院所居“在韩、文两祠之间”，即居于韩愈祠与文天祥祠之间。这一空间安排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宣言：他要培养的，是既能像韩愈那样传播文明、又能像文天祥那样坚守气节的新国民。

的建兰名品“银杆素”赠予广州兰圃，每次来穗，必入园观兰问兰。他题诗盛赞：“越秀公园花木林，百花齐放各争春。唯有兰花香正好，一时名贵五羊城。”

半生戎马，历尽沧桑，晚年最牵挂的，竟是几盆无声兰草。他写下“纵使无人见欣赏，依然得地自含芳”。这哪里仅仅是咏兰，更是老一辈革命者淡泊自持、清白守心、初心不改的人格写照。

兰，承载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底色。孔子咏其德，屈原纫其芳，板桥绘其骨。兰是君子的象征：低调清正，自持宽厚，不争不躁。岭南本就是国兰故土，建兰、墨兰、寒兰在此生生不息。岭南文化清雅温润、雅俗共赏，恰与兰的品性天然契合。兰圃静立越秀山下，隐于繁华城中，本是一方安心灵净土。

时代愈喧嚣，城市愈繁华，我们愈需要这样一处安静的精神栖地。兰的品格，正是当代人稀缺的力量：不跟风、不浮躁、不张扬，默默扎根，悄然生长，静待花开。百花争艳是世间热闹，一兰自芳是生命境界。

一座兰园，藏一城文脉，载千年风雅。以兰载文，以文化城。让幽幽兰香浸润羊城街巷，让君子风骨融入城市血脉。

数次访兰，我从赏兰观形，慢慢读懂兰韵、心生敬畏。望着朴素兰草静静吐芳，我常在心底自省：人生最好的状态，从来不是热烈张扬，而是安静笃定；不是万众瞩目，而是自守清香。不必急着争春，不必急于证明。默默扎根，静静沉淀，时机既至，自有芬芳满园。

愿越秀山下这缕兰香，漫过市井烟火，飘过珠江两岸，润泽大湾区万千人心。

愿你我于浮躁尘世之中，养一份兰心，守一份清骨，存一份安宁，怀一份笃定。

不争，自有风骨。不语，自有芬芳。

可能是他最早将暨大写进诗中

□毛庆耆

今年是暨南大学成立120周年。暨南大学前身叫暨南学堂，1927年始更名为暨南大学，8年后的1935年即有人作古体诗《袍袍》：“暨南大学读诗人，除却星期隔日临。曳杖穿袍非狎世，中年加重老成心。”这可能是暨大最早被写入诗中。

《袍袍》的作者阮退之（1897—1979），广东阳江人，1935年被暨大聘为诗学教授，故作《袍袍》记录其事。从诗中可以看到一位38岁的中年人穿长衫持手杖，每周一、三、五或二、四、六出现在暨大课堂解读诗学的形象。

阮退之在大学毕业后，其诗作流布岭南，已有“南国诗人”的美誉。同时，他的书法也很有名，被称为“章草专家”。其《闲窗》诗题注云“一九三五年接暨南大学诗学教授聘书时作于上海”。《闲窗》共三首，其二云：“教授头衔亦所耽，况予跌宕在东南。江山寂寞咸同后，例有诗人一二三。”其

三云：“扶掖雍容渐老成，在诗则与古相争。岭南到此三千里，不见人间第四名。”可见他是颇为自信自得地接聘这个诗学教授头衔的。阮退之的自信是他对于诗作有自己的标准，他认为诗不是象牙塔中的自赏，其《论诗》云：“商量诗派光宣后，对客曾为破壁言。艺术之官多自赏，凡人投影到农村？”在《闲窗》其一写道：“闲窗落叶吹来去，一枕风蝉不定声。客过每多天下问，纵横几见为苍生。”——作诗和言诗应“投影到农村”“为苍生”。在《笔下》诗中，他更直呼：“愿将绝句三千首，写出农村破产声。”正因为他有情系苍生的诗论，故自信地认为“江山寂寞咸同后，例有诗人一二三”“不见人间第四名”。他在暨大的时间不长，诗作除《袍袍》诗外，尚有《真如寻菊》《除夕真如作》《探邻》《感旧》等。《南归绝句》题注“1937年作于香港”，表明他在暨大前后只有两年。

阮退之不仅是诗人、书法家，他

的平生经历更有奇特之处。阮退之是早期中共党员，曾经组织开展阳江的农民运动。在江西根据地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党中央特科协助国民党将领莫雄成立由我党掌握的“江西第四区督察专署和剿共保安司令部”，阮退之被派往江西德安从事隐秘战线工作，在专署内担任文教科长一职。他有《碧台》诗记载当年住地情景。莫雄在参加国民党的庐山会议期间，获悉“围剿”红军的所谓“铁桶计划”，将情报传递给红军高层，使得红军提前实行战略转移，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。1947年，阮退之获悉国民党准备对莫雄下毒手，冒险通知莫雄，令其化险为夷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阮、莫二人在政府同一部门工作。阮退之利用诗人、书法家身份，往来港穗之间，获取一些敌特情报。阮退之在新中国生活了30年，留下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诗篇。